

斯科塞斯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黑道理论^①

马丁·杰伊¹ 著,邹真吾² 译

(1.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历史系,美国 伯克利市 94720;

2.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1930年代,在美国流亡的阿多诺、霍克海默等法兰克福学派诸家提出了社会黑道理论,对当时黑帮盛行的美国社会展开批判,试图由此解释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无论是作为社会中的支配形式,还是作为主导意识形态,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市场原则已经被黑道社会的人身保护关系所取代,甚至新兴的工人运动也充斥着黑道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黑道理论预言了特朗普在任期内的种种行为,这一点也在马丁·斯科塞斯导演的电影《爱尔兰人》中得到揭示。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黑道社会;《爱尔兰人》;工人运动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22)04-0138-08

2016年12月5日,亚历克斯·罗斯(Alex Ross)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法兰克福学派早就知道特朗普的到来》("THE FRANKFURT SCHOOL Knew Trump was Coming")^②的文章。实际上,最近人们不断地宣扬道,法兰克福学派在大体上预见了民粹民族主义的崛起,尤其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出现。一般而言,人们主要把视线聚焦在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威权人格、右翼政治煽动家技术以及反犹主义的批判上。然而,很多人都忽视了他们遗产的另一面向。这个侧面使他们对问题的心理及文化根源的洞见更为完足,并深化了他们对煽动家蛊惑技术的分析。我这里讲的,就是他们对其

笔下“黑道社会”(racket society)的分析,旨在解释为什么法西斯主义会出人意料地崛起,而这个分析常被人们忽视。

我们先宕开一笔,去看看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2019年广受好评的电影《爱尔兰人》(*The Irishman*),然后就会完全理解这个问题与现时的关系是多么相关。这部电影刻画了黑帮杀手弗兰克·希兰(Frank Sheeran)的职业生涯。他手下最著名的受害者之一,就是货车司机工会主席吉米·霍夫法(Jimmy Hoffa)——至少在《我听说你是个“油漆匠”》(*I Heard You Paint Houses*)一书中,他是这样对他的传记作者查尔斯·布兰特(Charles Brandt)说的。无论这部电影是否令人信服地

作者简介:马丁·杰伊(Martin Jay),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荣誉教授,思想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专家,从事法兰克福学派史、西方思想史研究。

译者简介:邹真吾,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从事西方文论研究。

揭开了1975年霍夫法的失踪之谜,它都相当成功地勾勒出一个暴力、道德沦丧的世界的生动面貌,其中满是权钱交易,即使是表面上最忠诚的友谊,也常受背叛的威胁。这个世界只是间或受法律约束,冷酷无情、妇女的极度边缘化更彰显了其寡仁少义。在希兰生命的尽头,一位牧师接受了他的忏悔,并建议他多多少少追觅一下他无从感受的悔意。尽管有牧师的指引,但宗教也无法真正开辟一个空间,让他逃离这个他活了一辈子的人间地狱。

或许,《爱尔兰人》看上去不过是对各类黑帮片的一种挽歌式致敬——比如《教父》(*Godfathers*)三部曲、六季《黑道家族》(*The Sopranos*)和斯科塞斯本人早期的一些经典之作。然而,这部电影并未让我们真正沉浸于黑帮文化,正如影片一处糟糕的设计所体现的那样:希兰能说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是因为他服过兵役——在萨勒诺(Salerno)^③的海滩上,那些美国大兵可根本没时间阅读但丁。希兰不是意大利人,不能成为一个“黑帮好汉”(made man)^④;霍夫法有德国和爱尔兰背景,因此他也根本不配成为一个黑帮“家族”的成员。尽管罗伯特·德·尼罗(Robert De Niro)和阿尔·帕西诺(Al Pacino)——这两个演员把角色刻画得多么鲜活——邀请我们回到那个由马里奥·普佐(Mario Puzo)和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缔造的世界^⑤;但他们塑造的这个故事本身,并没有局限在种族出身上面。

《爱尔兰人》之所以能对那个社会进行如此有力的描画,是因为它鲜明地展现了一点:黑帮的活动和准则已经渗入诸多其他体制(institutions)之中。工会活动是重灾区——国际卡车司机公会(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Teamsters)的满盆资金就是供黑帮贷款的存钱罐;霍夫法因贿赂陪审团、试图行贿和诈骗而锒铛入狱,而在他被弗兰克·菲茨西蒙斯(Frank Fitzsimmons)取代后,工会甚至越发腐败。司法系统亦然——法官被收买,陪审团收

受贿赂,律师也能放心大胆地用肚子里的几本坏账(playbook),钻法律的空子。最耸人听闻的是,它渗入了政治领域——约翰·菲茨杰尔德·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成功当选总统,全靠他在伊利诺伊州非法贿选;他入侵猪湾是为了把赌场老板们带回哈瓦那;霍夫法被尼克松假释,是因为他对其当选大捐一笔;而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有可能(仅仅是有可能)是受雇于黑帮的杀手。这个黑道社会中,政治活动已经沉沦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当鲍比·肯尼迪(Bobby Kennedy)胆大妄为地打破常规,追捕霍夫法时,众黑帮简直觉得难以置信。

不管电影里的这些设想在何种程度上出于主观臆测,事实上,相比于希兰和霍夫法的世界,《爱尔兰人》也许更多地展现了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真相——这个社会噩兆频仍,越来越像法兰克福学派口中的“黑道社会”。这个概念最早由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其社会研究所的同事提出。彼时他们正在美国流亡,想用这个概念阐释纳粹德国的起因——正是这个政权,把他们逐出德国。研究结果无疑是含混不清的,因为在这个全面的研究计划中,仅仅诞生了一些未完成的论文,随后研究中的相关论述也仅留下一些颇具随机性的痕迹。但是,最近的种种事件激发了人们从他们的未竟之业中重寻真知灼见的兴趣。^[1]

在1934年的美国,亦即霍克海默及其同事的流亡地,“黑道”(racket)和“黑道行为”(racketeering)是两个新造词,指日益增多的“组织性”或“集团性”犯罪。俟禁酒时期(Prohibition)结束,这种犯罪就兴盛于各种其他非法活动中,比如卖淫、毒品交易、非法博彩(numbers-running)^⑥和赌博,并轻而易举地蔓延到其他腐败堕落的形式中,包括政治。法兰克福学派就此展开思考:在整个社会被黑道模式腐化后,人们会不会为了对抗日益残酷的世界,从而建立起人身保护关系(protection)^⑦,由

此把社会变成一个由个人效忠关系结成的共同体呢?黑帮中保护者和被保护者之间那种交易性的、具体的关系,是不是已经取代了普遍的道德准则和法律的抽象约束呢?一些其他支配方式里的等级关系(它们并不由经济生产方式决定)——无论在阶级斗争方面,还是阶级团结方面——是不是都已取代了阶级的角色呢?资本主义时代会不会仅仅是一个插曲,衔接着两个并不以客观市场(impersonal marketplace)为中介来维持服从和效忠关系的时代呢?

以上种种也引起了一些德国的其他流亡者的注意,他们看到这些黑道行径竟能和他们由之逃离的、在欧洲发生的事件如此相似。1941年,在一部“寓言剧”(parable play)《阿吐罗·魏发迹记》(*The Resistible Rise of Arturo Ui*)中,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就刻画了一个在1930年代控制地下菜花交易的芝加哥黑帮暴徒,以讽刺希特勒的发迹史。这部剧以一场规模更大、更为邪恶的犯罪活动,取代了《三便士歌剧》(*The Threepenny Opera*)中那种颠覆性魅力的小罪犯网络。不过,在布莱希特的创作生涯中,这部未演出的话剧算不得成功。实际上,西奥多·W·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后来批评了这部剧,认为它将法西斯主义写成了“一场意外,就像是不幸和犯罪一样”,而非“由社会力量凝聚而成的产物”,^[2-3]从而消弭了法西斯主义带给人们的真正恐怖。

尽管阿多诺及其同事们在南加州流放期间与布莱希特的关系比较紧张,但在1930年代后期,他们也开始思考黑道更为深广的意涵。1942年,在一部未发表的手稿《黑道与精神》(*Rackets and Spirit*)中,霍克海默断言:“黑道就是支配的基本形式……群体实践最普遍的功能性范畴,正是人身保护。”^[4]²⁸⁷⁻²⁸⁸同年,在他的通信中,他特别希望研究所各家之间可以通力协作,将黑道模型应用于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重启最初的跨学科研究计划。^[5]他逐渐相

信,只有在古典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才会以生产方式及其孕育的、受经济决定的阶级为中心。在其复苏的过程中,某些更直接的法则,以更久远的形式,在全新的伪装中回归了。在那业已稳固的统治阶级与逐渐团结的工人阶级发生冲突之前(二者的相互作用又以市场工资关系和法律条文为中介),就有一大帮黑帮团体在虎狼相争;掌管这些团体的人,就是那些通过强施保护,以换取手下服从的大佬们。在阿多诺称之为“一个闭塞的、暴力的、纪律严明的小团体——一个黑道团伙”^[6]中,对那些妄想僭位者而言,受报复的威胁永远阴森森地伺机降临。

在1941年出版的《理性的终结》(*The End of Reason*)一书中,霍克海默说:“皮条客、雇佣军头目、庄园主和行会师傅从来都是一面保护着其附庸(client),一面剥削着他们。人身保护正是支配的原型。”^[7]在这个后自由主义时期(post-liberal age),不论它被称为垄断资本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这种直接的、无中介的权力组织在此团体化的倾向中死灰复燃。其中,任何声称能代表公众利益或普遍信念的自吹自擂,都被弃置不顾。

1943年,在一篇未发表的文章《论阶级关系的社会学》("On the Sociology of Class Relations")中,霍克海默对其黑道理论进行了最为浓墨重彩的论述,并表现出他对经典马克思主义鲜明的背离:

黑道模式曾是一种典型的、由统治者施于被统治者的行为,现在则是所有人类关系的代表,甚至在工人阶级中也是如此。在资本家和工人中,黑道的表现并不相同——在资产阶级中,整个阶级皆得利于黑道;而在工人中,黑道仅仅为领导者和上层工人(worker-aristocracy)的垄断推波助澜。^[8]

与文化研究所诸多人始于魏玛共和国时期,被流放后也未曾停止研究不同,^[9]霍克海默没有把关注点放在工人阶级矛盾的心理结

构或其意识形态偏见上。他提出了一种结构性分析,指出工人并非在反抗资本主义统治阶级,而是照猫画虎地内化了其支配模式。

黑道模式在社会组织中的回归,意味着一些普遍化的中介机制也随之衰弱:在自由资本主义如日中天之时,这些机制的功能是被含混化了的。其中之一就是客观市场,它乃基于一种意识形态化信念:个人的功绩与奋斗都可能得到公平的回报。正如研究所的政治理论家奥托·基希海默尔(Otto Kirchheimer)所说:“黑道意指这样一个社会:人们已不再相信仅仅依靠客观市场的能动性作用,他们的努力就能开花结果。”^{[10]180}在揭开意识形态假面,暴露出真正的支配形式这一点上,或许有人会对黑道社会的回归报以十分勉强的欣赏,因为它揭穿了那些鼓吹机会均等和市场公平的谎言。但是它所暗中破坏的,也正是这种意识形态常常葆有的辩证性出路。

在《黑道与精神》中,霍克海默论道:“每一种黑道行为都全为自己,共谋着与精神作斗争。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和谐是内在于精神的,黑道则是那矛盾的对立面,是精神整一性理念中的混乱。”^{[4]290}对人身保护性质的小团体而言,无论是对法治的明确拒斥,还是对人之主权的理想化,都是同等可疑的,二者都受到其毫无歉意、目空一切的利己主义的嘲弄。因此,我这里再次引用基希海默尔的话:“这是一种社团性实践(associational practice)的经验,它表明无论是社团中的个人选择,还是整个社团追求的目标,皆非人类自由王国中的自觉行为。”^{[10]180}

霍克海默对黑道社会模型的论述痕迹散见于他战后的著作《理性的黄昏》(*Eclipse of Reason*),及其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中。它们也出现在研究所对政治煽动家技术的分析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阿多诺生前未出版的研究——他对当时法西斯电台的狂热煽动家马丁·路德·托马斯(Martin Luther Thomas)惯用的心理

技术进行的研究。许多相关文章仅仅以手稿形式呈现,在他死后方得以出版,而那个跨学科研究计划也从未实现。这个计划的理论曾大刀阔斧地设想人类历史将发生跨时代的转折;而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失败与自由民主制的成功延续,现在看来未免过甚其辞。黑道社会模式十分近似于研究所成员弗朗茨·诺依曼(Franz Neumann)强烈主张的晚期资本主义垄断分析,这就使其看起来像是尴尬地依附于弗雷德里希·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一样。然而,前者暗指黑帮的明争暗斗,其无政府(至少是多极化)色彩更为鲜明,也许进而会变为一片混乱;后者则更强调“计划经济”的胜利——它以工具理性为系统掌舵,平息其冲突。尽管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波洛克的全盘接受备受争议,但他确实启发了他们后来的“管制世界”(administered world)概念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单向度社会”概念。相比于黑道人身保护关系中个人化的权钱交易,资本主义交换原则在此释放的更客观的抽象力量仍更为有效。

还有一个原因使以上诸位对此犹豫不决。他们意识到,虽然猖獗的黑道行为驱逐了那些中介性的意识形态,但它们仍然葆有微弱的力量,以对抗黑道的全面实现。在《黑道与精神》中,霍克海默亦有所妥协:“民主的真正理念(它以一种受压抑的、不见光的形式存在于大众之中)一直在暗示着:一个得以远离黑道的社会从未绝迹。”^{[4]291}1944年,阿多诺以一个流亡者的身份进行了反思,认为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仍具备价值的功能。他承认:

我们所以存活,要归功于晚期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与其政治表象之间的差异。对于理论化的批判而言,这种差异微不足道:我们无论如何都能论证,在真正的政治决策中,所谓公众意见,所谓经济的决定性,完全是虚假的。但对无数的人们而言,资本主义那轻薄易逝的面纱,正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基。^[11]

此外,我们必须认识到,有一种不那么温和的意识形态力量,恰恰在极力鼓吹最纯粹的“保护者-附庸”(patron-client)之间交易性的黑道模式——说得明确一点,就是种族灭绝主义的反犹主义(exterminationist antisemitism),正是它助长了纳粹的兴起。

最后,针对以下这种恶劣的情况——一些工会工人完全被黑道腐蚀,原样照搬了资本主义的整体垄断结构——或许也有人进行了更多的思考。事实上,很多大企业家早就提出过这个观点。比如,在1929年出版的《这是欺诈!》(*It's a Racket!*)一书中,戈登·L·霍斯特特(Gordon L. Hostetter)和托马斯·奎恩·比斯利(Thomas Quinn Beesley)就让工人运动名誉扫地。1942年,当研究所仍然用一种末世论式的措辞,把法西斯主义视为全球性大灾难时,霍克海默就已经写下:“无产阶级的历史进程迎来了转折点:要么形成阶级,要么沦落黑道。‘黑道’意味着他们在一国之内的无上特权;‘阶级’意味着世界革命的到来。元首(The Führer)已经把选择权从无产阶级手中夺走了:他们选择了黑道。”^[12]不过,在研究所内部,这种观点的极端性也引发了质疑。在写于1943年的一封信中,马尔库塞对霍克海默的手稿《论阶级关系的社会学》做出回应,警告他说:

你要慎之又慎,不能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你把“从阶级斗争到阶级顺化的转变”认作既成事实,认作事情的全部。……工人阶级整体与垄断社会机器之间,并没有成功发展成合谋关系,在这个国家没有,在德国和法国肯定没有,在英国很可能也没有。^[13]

战后,当一切尘埃落定,霍克海默给出的激进选项似乎显得过分夸张,正如一战期间,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也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和野蛮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尽管工会绝对存在腐化堕落的可能性——霍夫法的卡车司机公会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都证明了这一点;但把这些新生的黑道行为都

进行危险的夸大——往往是那些败坏工会的政治宣传家们才谙熟此道——也是不公平的。

霍夫法把我们带回了开篇的问题:那在《爱尔兰人》中被详尽描绘的、早已被法兰克福学派“黑道社会”理论预言的异常腐败的社会泥潭,在多大程度上展现了我们这个世界的面貌呢?或许在当代一些所谓“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中,我们就能找到黑道社会最鲜明的平行例证。在这些国家里,军阀无视法律和公众利益,对财产和权力展开激烈的争夺。索马里、利比亚、阿富汗和苏丹就是最生动的例子,我们也可以轻松举出其他一些正在走向毁灭或复兴的国家。一些评论员甚至将“黑道社会”模型应用于伊斯兰国这样的案例,尽管伊斯兰国对伊斯兰教所做的原教旨主义阐释表明,其动机不仅是那强大的中介性意识形态,更是权力欲和财产掠夺欲。但其他一些例子则无疑与黑道模型密切相关——准军事组织、对毒品和武器的非法交易、劫持人质、绑架以及频频发生的性侵——这些行为蛇鼠相混,贯穿其间的则是个人的飞黄腾达。那中介性的、普遍化的意识形态或社会机制失去了其缓和力量;只有投奔最可靠的保护者,人们方可自保。国家主权——无论是否受到大众欢迎——都会被削弱到几乎荡然无存,因为合法的权威被赤裸裸的强权取代,而马克斯·韦伯(Maximilian Karl Emil Weber)那著名的“现代国家对暴力的垄断”,也由此终结。

当然,在政治领域以外,黑道的表现就更多了。无论如何,它仍然笼罩着工人运动,依旧存于(至少在精神层面上)其他社会机构中——从大制药公司(big pharma)到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international sports federations)皆是如此。就连天主教会也被其污染——持续不断的恋童癖丑闻,以及梵蒂冈银行(the Vatican Bank)最近曝出的鬼把戏,刷新了我们对“上帝保佑”(the protection of God)的认知。

“黑道社会”模型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当前的政治环境呢?

当法兰克福学派试图用“黑道社会”分析解释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时，他们确实走得磕磕绊绊。一方面，它低估了意识形态冲动的力量；另一方面，它太过野心勃勃地指出，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已经翻开了划时代的一页。在它对于工人运动的夸张描述中，工人只能在引领人类革命和堕入黑道之间二选一，这是对其他崇高出路的侮辱和蔑视。在选举廉洁的领导人时，工人们是可以选择站在进步的、非革命的政治一边的。在工人运动的未来图景中，肯定会出现吉米·霍夫法这号人物，但也绝不会只有他这类人。

如果我们认为黑道社会模式完全符合当前的社会现状，当然会把问题简单化。将我们带到当前这个重大历史节点的，是太多其他漫长的历史趋势和意想不到的事件。但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当前政治文化中那种让人不安的范式上，聚焦到许多不同社会和文化语境下支配与保护的无中介的辩证法中，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爱尔兰人》可以被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典范电影。当我们领悟了黑道在现实中的镜面效应，对它在娱乐工业中被传奇化的表象有所体认，我们就会看得更加清楚：特朗普是如何从黑白两道的互动中受益的。

最后，或许只有把《爱尔兰人》和美国影史上另一部伟大的工人黑帮片进行比较，我们才会意识到，我们已经堕落到何种境地。1954年的《码头风云》（*On the Waterfront*）描绘了“吹哨人”（whistleblowers）受尽折磨的历程：他与黑帮断绝关系，背弃对黑帮家族的忠诚，与控制霍博肯码头工人工会（Hoboken's longshoremen's union）的暴虐的黑帮老大做斗争。电影完全与种族血统无关（正是这一点，让斯科塞斯的电影看上去像个夕阳下的黑帮寓言），而是呈现了对工人黑帮勇敢的反抗。诚然，长久以来，这部电影一直深受指责。人们谴责导演伊利亚·卡赞（Elia Kazan）和编剧巴德·舒尔伯格（Budd Schulberg）借着电影给自己鸣不平（在麦卡锡时代，他们从国会中被除名），把警察探

子（stool pigeon）英雄化了。1999年，当卡赞被授予奥斯卡终身成就奖时（讽刺的是，颁奖嘉宾正是马丁·斯科塞斯和罗伯特·德·尼罗），人们对他仍然褒贬不一。这表明，人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完成对他的谅解，而并非所有人皆然。

无论我们如何评判电影中自我辩白性的潜台词，就其本身而言，《码头风云》生动地证实了法兰克福学派发现的黑道社会的存在。它呈现的并非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而是工人运动内部的冲突——在更为封闭的范围内，在一个阶级之内，支配得以被再生产。不过，相比《爱尔兰人》，这部电影描绘了一个更有希望的蓝图，展现了人们如何成功地推翻黑道社会。这部电影有一个鲜明的宗教发言人形象，即卡尔·莫尔登（Karl Malden）饰演的码头牧师巴里神父（Father Barry）；此外，在反抗黑帮的过程中，影片还为女性安排了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即英雄主人公的女朋友艾迪·道尔（Edie Doyle），由爱娃·玛丽·森特（Eva Marie Saint）饰演。马龙·白兰度塑造的令人难忘的特里·马洛伊（Terry Malloys），一名屡遭厄运的拳击手，用他那只能被称作无私的“激情”，让可能到来的救赎熠熠生辉。电影结尾，由李·J·科布（Lee J. Cobb）饰演的、残忍的约翰尼·弗兰德利（Johnny Friendly）的魔咒破灭了，码头工人摆脱了曾奴役他们许久的黑帮保护。不过，他们获得拯救的方式仅仅是回去工作，而非继续反抗他们仍深陷其中的、更大的资本主义语境，这大概表明电影的批判野心仍有不足。但与《爱尔兰人》相比，这依然值得庆祝——在《爱尔兰人》中，希兰只能在旧时月色中活得舒心，他不得不孑然一身地与回忆相伴，更要遭受亲生女儿的冷眼。

如果说《爱尔兰人》所描绘的比《码头风云》更接近于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这是因为在我们中还没有勇敢的马洛伊站出来，打倒白宫里的那个弗兰德利，反抗他的黑帮保护。因为他的统治根基十分顽固，所以要打破这个魔

咒,可谓任重道远。他的支持者对“吹哨人”毫无尊重可言——一段时间以前,在完全不同的情形下,那些对卡赞不可饶恕的批评亦是如此。实际上,特朗普在很多方面上的特立独行,大概预示了更肮脏之事的来临。我们也许并没有生活在一个彻底无可救药的黑道社会,但相比于那个纳粹德国流亡者试图阐释其黑暗时代的时期,我们对之更为接近。长期以来,他们好像误入歧途,连他们自己都承认这一点。但如今,呜呼哀哉,当那个千夫所指但“一身清白”(exonerated)的黑帮头子很可能连任之际,我们可不敢这么肯定了。

(翻译校对:赵勇)

【注释】

- ① 本文于2020年4月5日发表于《洛杉矶书评》杂志(*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原题为"Trump, Scorsese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s Racket Theory of Society",经作者授权发表,摘要为中译者所加。
- ② 亚历克斯·罗斯(Alex Ross)自1996年起担任《纽约客》杂志专职音乐评论家。他写过不少古典音乐批评,从大都会歌剧至当代先锋音乐皆有所涉猎,而且也撰写过很多关于文学、历史、视觉艺术、电影和生态学的文章。这篇题为《法兰克福学派早就知道特朗普的到来》("THE FRANKFURT SCHOOL Knew Trump was Coming")的文章,发表于《纽约客》杂志2016年5月刊的“文化评论”(Cultural Comment)专栏。——译注
- 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艾森豪威尔的“雪崩计划”下,英美盟军于1943年9月在意大利南部的萨勒诺登陆,与德军交战。是年9月17日,英美军队在萨勒诺取得了胜利。——译注
- ④ 在黑手党中,“黑帮好汉”(made man)指黑帮的正式成员。一个人成为“黑帮好汉”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是意大利血统;第二,必须经由另一位黑帮好汉的引荐。接着要发誓保密和效忠,方可正式入帮。“黑帮好汉”内部等级森严,由低到高分为了“小卒”(soldier)、“小头目”(caporegimes)、“顾问”(consigliere)、“二当家”(underboss)、“老大”(boss)。——译注

- ⑤ 马里奥·普佐(Mario Puzo)是小说《教父》的作者。《教父》后由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翻拍成电影。——译注
- ⑥ “numbers-running”,也称“numbers racket”,特指非法的赌博活动,故翻译为“非法博彩”。其主要流行于美国的贫民区或者工人社区,由赌博者选三个数字,看是否会和次日随机开出的三个数字吻合。——译注
- ⑦ 据《韦氏词典》,“protection”指“黑帮收取保护费,以建立人身保护关系”。译者考虑到汉语的表达习惯,翻译成“人身保护关系”。文章其他部分中的“人身保护”或“保护”,读者皆不能忽略其中的“保护费”意涵。——译注

【参考文献】

- [1] FUCHSHUBER T. Rackets: kritische theorie der bandenherrschaft [M/OL]. Freiburg: ça-ira-Verlag, 2019 [2016-01-11]. <https://nonsite.org/max-horkheimer-and-the-sociology-of-class-relation>.
- [2] ADORNO T W. Commitment[M] // Notes to literature: vol. 2. Trans. NICHOLSEN S W.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83.
- [3] ADORNO T W. Extorted reconciliation: on Georg Lukács' realism in our time[M] // Notes to literature: vol. 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222.
- [4] HORKHEIMER M. Die rackets und der geist[M] //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12: Nachgelassene Schriften 1931-1949. Frankfurt: Fischer (Tb.), 1985.
- [5] HORKHEIMER M. Letter of October 1, 1942, to Leo Lowenthal[M] //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17: Briefwechsel 1941-1948. Frankfurt: Fischer (Tb.), 1996: 342-343.
- [6] ADORNO T W. The psychological technique of Martin Luther Thomas' radio addresses[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68.
- [7] HORKHEIMER M. The end of reason[M] //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New York: Urizen Books, 1978: 35.
- [8] HORKHEIMER M. Zur Soziologie der Klassenver-

- hältnisse [M] //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12: Nachgelassene Schriften 1931 – 1949. Frankfurt: Fischer (Tb.), 1985: 101 – 102.
- [9] FROMM E. The working class in Weimar Germany: a psych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study [M]. Trans. WEINBERGER B. Leamington Sp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417 – 439.
- [10] KIRCHHEIMER O. In quest of sovereignty (1944) [M] // Politics, law & social change: selected essays of Otto Kirchheim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 [11] ADORNO T W. Minima Moralia: reflections from damaged Life [M]. Trans. JEPHCOTT E. F. N. London: Verso, 1974: 112 – 113.
- [12] HORKHEIMER M. Geschichte der amerikanischen Arbeiterschaft (1942) [M] //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12: Nachgelassene Schriften 1931 – 1949. Frankfurt: Fischer (Tb.), 1985: 260.
- [13] MARCUSE H. Marcuse to Horkheimer, September, 1943, technology, war and fascism, 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 vol. 1 [M].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246.

[责任编辑 罗 欢]

Scorsese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s Racket Theory of Society

Martin Jay¹, Trans; ZOU Zhenwu²

(1.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94720, USA;

2.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Racket Society" was a theory held by the Frankfurt School represented by Adorno and Horkheimer in their American exile back in 1930s, aiming to criticize the racket prevailing American society and explain the unexpected rise of fascism. For the Frankfurt School, not only in terms of domination of the society but ideology as well, liberal capitalism characterized by mediation of impersonal marketplace had been replaced by mobsters' protection. The same thing even happened in the newly flourishing labor movements. Thus, the Frankfurt School's "racket society" theory to some extent became a prophet of Donald Trump during his presid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was also revealed in the movie the Irishman directed by Martin Scorsese.

Key words: the Frankfurt School; Racket Society; the Irishman; Labor Movement